

第一章 从计划走向市场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文化的嬗变乃是历史足迹的记录。因此，只有置身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宏阔的历史场景中，才能对当代中国文化领域沧桑巨变现象作出深入的解释。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基本内容，集中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系统和复杂的过程。它不是原有社会结构中某些个别安排的局部改变，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也不是对现行制度规则的运行过程作边际上的微调，而是全部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即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的宏阔的历史背景。

一 计划体制及其文化形态

1978 年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社会特征及其在文化上的表现，构成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嬗变现象解释的基本理论参照和前提，职是之故，在此为了解释后一种现象，便须从描述和分析前者开始。

1. 计划体制的设计与人性假定

经济体制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经济体制通过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确立社会和经济的激励机构，引导人们采取可预测的因而是有秩序的行为，从而沟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选择和公共选择，减少外部性，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体制的变迁，不仅取决于技术和生产力的状况，而且也取决于经济体制与文化遗产的相容程度。反之，经济体制一旦确立，又不仅会对技术生产力的变化产生反作用功能，而且会规定文化的发展方向。而经济体制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实质可以归结为经济体制的设计与人性假定或人的行为假定的关系。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定或人的行为假定的基础上。这种假定可能是外显的，可能是隐含的，可能是人们在理论体系中明确表达的，也可能是日常经验和无意识的。这是因为经济体制的约束、激励、配置资源等功能只有通过人才能发挥作用。经济体制的设计首先要考虑的是实现个人目标和体制目标的‘激励相容’问题。经济体制中个人的行为是否会偏离‘激励相容’的设计初衷，直接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效率。另一方面，把经济体制与文化的关系归结为经济体制设计与人性假定或人的行为假定的关系，也是因为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承担者。

何谓人性？按照卡西勒的观点，人性即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

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 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① 因此 对一定经济体制下文化现象的分析，人们可以透视作为一定经济体制设计的前提和基础的人性假定，而对作为一定经济体制前提和基础的人性假定的把握，则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一定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文化。人性的假定对文化的流向、对经济体制的设计和确立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儒家与法家的分野、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其源头都可看到各自对人的行为或人性假定上的区别。

显而易见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类活动的体系”无疑规定和划定了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前提的人性假定的圆周，计划体制下的文化则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而对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前提的人性假定的把握，则是我们理解计划体制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模式的重要环节。因此，研究计划体制下的文化现象、文化发展模式等，必须从分析计划体制及其前提和基础即人性假定入笔。

计划经济体制也称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中央计划管理部门垄断社会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国家逐级下达计划的行政方式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完全的社会公有制、完全的集中计划和按劳分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三大基本要素。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暗含着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假设。按照胡汝银的归纳 这些假设包括：

(1) 信息是完全的，如果信息费用不为零，至少也是足够低

^①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7 页。

^② 胡汝银：《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4—15 页。

的。完全信息意味着中央计划机构可以获得消费者偏好、产品生产函数和要素贡献（特别是劳动贡献）这三个方面的全部信息，意味着计划者未拥有任何非公开的私人信息，从而，计划制定者能够掌握计划执行者所拥有的所有信息。完全信息也意味着中央计划机构可以避免任何计划决策失误，从而不存在承担财务上的盈亏责任问题。完全信息和信息费用趋近于零，共同产生了完全的集中计划，使得计划边界能够没有约束地涵盖全部经济活动。

(2) 在按劳分配规则下，激励是完全相容的，即个体利益的增进与社会利益的增进是完全一致的。

(3) 实物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是需求导向的，且供给与需求普遍相等，整个经济始终处于瓦尔拉一般均衡状态。

现实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总是对完全的计划体制的偏离。因此这里的“完全的计划经济体系”不是具体指现实中的一个国家的经济或一个具体的经济组织，它只具有理论模型的意义，是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作的理论抽象。理论模型的特征就在于：由于它的抽象性，它几乎不能直接地应用于一个具体的经济；但同时又因为它具有普遍性，因而可以在适当具体化的条件下应用于一切存在这种基本关系的地方。与作为理论抽象的完全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是，完全计划经济体制所暗含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假设，也是一种理论模型。同样，与上述相关，我们将要分析的作为计划经济体制前提和基础的人性假定，也是相对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所暗含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假设而言的，因而也是一种理论抽象或模型。我们所要阐明的是，完全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经济主体的人性究竟有何要求，或经济主体必须具备哪些人性因素，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或功能？

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机制的经济约束与刺激结构，与之相应，计划经济体制也内含着不同于市场

经济体制的人性假定模型。对长期在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如东欧等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及其文化现象加以分析、概括、抽象之后，可以发现，完全的计划经济能够建立并得以运行，必须奠定在以下两点人性假定的基础上：

(1) 是计划者具有完全理性。完全的计划经济暗含着完全信息的假设。正如前述，完全信息和信息费用趋近于零，共同产生了完全的集中计划，使得计划边界能够没有约束地涵盖全部经济活动。作为计划经济完全信息假定的一个自然推论，便是计划经济的管理者必须具有完全理性。所谓理性，简单说来就是指，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和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用西蒙的话说，理性指的是：经济主体具有关于他所处环境的完备知识，有稳定的和条理清楚的偏好，有很强的计算能力，从而使他选中的方案自然达到其偏好尺度的最高点。^① 路斯和莱法则从博弈理论的逻辑出发，把理性定义为：“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中，博弈者选择能产生较合乎自己偏好的结果的方法，或者用效用函数的术语来说，他将试图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②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乐观主义”的看法。按照完全理性假定，计划经济的管理者总是具有敏锐的目光、充分的计算能力与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这是因为计划者要制定准确的计划，就必须掌握全社会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劳动力品质、资本存量、社会资源的约束和生产可能性、消费者的偏好及其需求数量等完全充分的信息。在获得完全充分的信息的同时，还必须有效地、合理地、及时地处理和集中上亿万计的信息。

参见〔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转引自徐传谔：《论企业家行为激励与约束机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维数并计算出合理选择的可能结果，精确地计算每一种结果对社会的预期效用 始终作出前后一贯的选择 其选择总是能使社会的效用或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就只能求助于计划者的无限能力或完全理性这个隐含假设了。所以 很显然 在完全计划经济的模式里，与信息费用为零假设共存的，必然有一个关于计划经济管理者具有无限的或完全的理性的假设。也就是说 面对现代社会经济领域庞大的信息流量 计划者被假定具有可以无限扩大的认知能力、处理能力和计算能力。^①

(2) 是经济行为主体的道德人假定。就市场经济而言，其关于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动机的基本假定，就是众所周知的经济人的假定。由于“经济人”构成“道德人”分析的基本理论参照 因此 这里的分析必须从“经济人”概念的界定入手。所谓经济人 依照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 是指有理性、会算计、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人。分析自亚当·斯密以来人们关于经济人的种种说法，这一概念无非有两个基本点 即自利与理性。所谓自利 是指人们的行为目标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所谓理性 则是人们为有效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逻辑一贯（不自相矛盾）地理智权衡手段——目的、成本——收益的工具理性及摒除主观情感的、冷静的、一意计算利害得失的理智态度 或者说 在各种可能的选择方案中 人们总是选择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个方案。在此 经济人又是精明以及具有创造性的“理性人”。关于这个问题 经济学家的看法也不一致。一些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证伪和批判 张宇燕将之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是从信息不完全的角度对理性最大化展开的批判 其代表为赫伯特·西蒙；其二是从人的社会性对单维经济人

参见张军：《中央计划约简下的计划权结构与财产权结构》，载《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 1992 年经济学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第 120 页。

所做的准确说是一种声讨，它主要来自制度学派；其三是借助人类行为的实验结果来对理性最大化所进行的证伪工作；最后则是用所谓‘X效率’来对最大化假定进行驳斥”。^①虽然这些批判和证伪也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都不足以否定经济人自利与理性这一基本假定。恰恰相反，这些批判和证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假定的进一步完善。对‘经济人’概念内涵的分析无疑为透视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和前提的人性假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和理论参照。依此反观计划经济体制，其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人”的人性假定的‘道德人’的人性假定便可一目了然。

“道德人”暗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里。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逻辑，就是认为“社会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利益的差别和冲突，它们是在思想、道德上充分发展和完善的个人，个人也不再是经济人，个人需要与社会的需要完全一致，甚至能够服从社会的需要”。^②计划经济体制之逻辑整体，要求用激发思想觉悟替代利益激励导出经济主体有活力、负责任的良性经济行为。这就决定了其行为主体即道德人与经济人相反的本质特征，即不计报酬出于某种高尚情操而克己奉献。在这里，“利益人”和“理性人”为“君子人”和“激情人”所代替。一方面道德人的假定要求计划经济管理者不计报酬，不计个人得失，使自身的偏好与社会福利偏好相一致，即计划者在安排社会生产、选择各种比例结构时所依据的优劣标准或轻重缓急的优先次序，也就是安排和选择在社会福利意义上的优先次序。具体地说，由于计划经济管理者必须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因此，它在安排社会生产计划时，必须以全民的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7 页。

〔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 年版，第 207 页。

福利为依据。另一方面 道德人的假定也要求计划体制下的其他经济行为主体应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纯粹的人”此是较强条件的道德人。同时 正如周建漳所认为的 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有限目标出发，计划经济所要求的行为主体也可以是某种退而求其次的较弱的道德人，即在缺乏相关权利安排的制度背景下先明智抑制利益考虑 恪尽义务 努力奉献 尔后在整体经济由此而来的发展中获得利益满足或至少是补偿。但是 即使是较弱条件的道德人行为之普遍化和持久化的条件也是十分苛刻的，“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义务、奉献在先的准道德人行为是以他人同样行事为前提的 此一行为的普遍与持久化需满足一个十分苛刻的条件 即合作群体中几乎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与公共利益目标不一致的行为。一旦此中出现了一个 甚至仅仅是怀疑有一个混在‘众人拾柴’队伍中的‘搭便车者’ 其行为就会很快‘传染’、‘扩散’ 人心浮动 直到合作瓦解。”^①

2. 计划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

经济体制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任何经济体制都暗含着作为其基础和前提的人性假定，而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及其人性假定前提下会形成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模式。

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依靠计划形式来对文化资源进行配置，文化发展中的基本决策权，都集中在计划者手中，文化发展具有高度集中计划的形式。在此，我们将樊纲等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关于集中计划机制

周建漳：“道德人”计划经济行为主体的制度假设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夏季卷。

的基本运行模式^①略作修改，便可得出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的基本运行机制：第一，计划者决定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计划，文化产品的创作者和生产者只是按照计划进行创作和生产，不能自行决定文化产品创作的品种和数量。第二，文化投资格局是全社会计划的一部分，是国家计划的结果，文化产业投资或积累由计划者统一决定，基层不具有投资自主权；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的必须经计划者综合平衡、统一计划批准后进行。第三，计划者规定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价格和“实际生产者价格”。所谓生产者实际价格由消费者价格、名义价格加上“政策性亏损补贴”或减去上缴利税后的生产者实际收入构成。第四，为执行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计划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由计划者统一调配；文化产品的流通，也由计划者组织；非短缺文化产品可由消费者自由选购，短缺文化产品则可以实行计划配给。

当然，需要予以说明的是，上述的文化发展模式，只具有理论模型的意义，是对现实文化领域中的实践活动所作的理论抽象。但是，这一理论模型，也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实践的更广阔背景下产生的。因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具体因素的作用，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的某些运行机制可能在一个国家中表现得不很明显，但在另一个国家中可能表现得较为明显，它们因而也会被概括出来，成为理论模型的组成部分。在前苏联，有一整套庞大而严密的对文化的管理网络。最高苏维埃是领导全国文化事业的最高组织，它颁布的文化建设法令由部长会议执行，而具体行使领导职能的是文化部、国家电影事业委员会、国家出版印刷书籍发行委员会等机构，其中文化部处于实际领导的中心地位。在各加盟共和国

^① 参见樊纲主编：《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74—75 页。

以及下属的加盟共和国均有相应的文化管理机构采用“条”“块”结合的领导方式，对文化产业严加管理。^① 在中国，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模式初步确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这种文化发展模式的特征，就是依靠行政手段对各种文化活动进行干预，并对文化企事业单位实行直接具体的管辖。其具体表现是：文化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由党政机关任命，工作人员由上级机关调配；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出版、演出等计划要向上级呈报获得批准方可实施，影片的放映发行以及节目公演都要经上级机关审查批准。1953 年底政务院还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规定：“今后必须切实建立统一集中、层层负责的审查制度。故事片剧本、大型纪录片拍摄提纲和完成片等均应由中央文化部电影局认真地完成初审，然后由中央文化部审查批准。”^②

但是，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之运行机制要能充分而有效地发生作用，其前提是计划者必须能够充分了解和掌握一个社会的文化资源的状况、文化的供给能力、文化的需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根据文化资源的状况与文化供给能力、文化需求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来合理配置文化资源，使之得以充分利用并发挥最大作用。但是，这些条件是难以达到的。

(1)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之运行机制暗含着完全信息及计划者具有完全理性的假定，但完全信息是不可能的而计划者的理性则是有限的。

现实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文化发展模式，总是严重偏离抽象的理论模型。导致这种偏离的基本因素之一，是信息费用或信息效率。换言之，信息费用与信息效率是决定计划边界和计划范围的

参见胡惠林主编：《文化经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28 页。

同上，第 232 页。

重要因素之一。当计划范围的边际信息费用恒为零或始终接近于零时，计划范围便可以无所不包，即能够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包括全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形成完全的集中计划。但是在现实中，信息并非免费物品，为了获得决策所需的信息，必须付出搜寻的代价，甚至有时候在许多情况下放弃信息的搜寻是明智和经济的。由于信息费用的存在，使得无论对于什么样的决策者来说，用于文化发展的决策的信息都不能达到完全充分的程度，在文化发展的决策上追求十全十美是不经济的行为。

另一方面，计划者的理性也不是无限的。计划者也是由担负计划职能的机构及其在机构中从事计划工作的人员构成的。不仅普通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计划人员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所谓有限理性，按照西蒙的定义，是指人们有达到理性的意识，但又是有限的。由于人类所处环境的约束和人类自身计算能力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知道全部备选方案，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价用函数当中，也无力精确计算出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

计划者的理性首先要受到环境的约束，即受到文化产品消费需求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正如布坎南所认为的，由于各人的偏好、能力、环境条件等各不相同，所以选择的主观性使得它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不可预测的。据此，布坎南不承认个人效用函数可以加总为一个社会福利函数。按照这一逻辑，对外部观察者来说，不论应用什么方法（包括借用历史统计资料）推测社会需求结构以及作为其制约因素的需求偏好的变化都是不可靠的。^② 文化

参见刘世锦：《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第 35 页。
同上，第 32—35 页。

需求作为人们的一种特殊需求，当然也具有布坎南所概括的人类一般需求的特点。所谓文化需求是指人们在一定时期内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精神需要而形成的对文化产品需求量，包括对实物与非实物形式存在的文化产品的需求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人类的文化需求是单一或较为单一的，则对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消费的计划便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人类的文化需求是极其复杂的和多种多样的，它既受价格因素的影响，也受人们的收入水平、文化素质、闲暇时间等因素的作用。不仅如此，人类的文化需求也是经常变化的，不论应用什么方法推测文化需求结构以及作为其制约因素的需求变化也是不可靠的。同时，依照布坎南逻辑的一个自然推论，个人的文化需求也是不可以加总为社会的文化需求的。罗贝尔·埃斯卡皮对书籍市场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埃斯卡皮认为，如果书籍满足某种定向的集体需要，人们就能同其他任何产品一样把书卖出去，这就是作为物品的书籍或是功能性书籍所处的状况。人们可以对百科全书、教科书、烹调书、色情书的市场、预测和计划进行研究，可惜我们知道，在文学过程中，每一个个人的每一种阅读行为都是独特的、无法取代的。它同一个人的其他阅读行为，或是同其他人的阅读行为之间的联系，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由此可见，即使把读者的行为转换成二元的说法：购买或不购买，那么当牵涉到另一本书的购买或不购买时，也很难从中得出结论。正因如此，所以埃斯卡皮进一步指出：“文学出版社按常规是不能编订计划的。然而不在最低限度上制定一个规划又无法使出版社生存下去。这一矛盾产生的结果是，文学出版社逐渐通过非文学的动机来争取文学读者，诸如习惯、赶时髦、炫耀性的消费，以及那种语言的言外之意，即隐含结构的边缘地带的巧妙运用或是文化

上的犯罪现象。”^①

同时，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消费之计划者的理性也受到人自身理性能力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归结于神经生理和语言两个方面。神经生理限制表现在个人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传递、处理信息的能力在水平和储量上所受到的限制。语言限制表现为个人无力运用文字、数目和几何图形使他人完全理解其知识和情感，不管人们如何努力，都可能是言不及意，从而不得不借助于其他方法如表演、边干边学以达到使对方理解的目的。人的理性受到自身理性能力的约束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计划者都不是先知先觉和料事如神的人，更非全智全能的上帝。实质上，无论什么样的计划者，他的知识经验和受教育的程度都是不完全的，对信息的处理和计算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计划者的有限理性是否可以用电子计算机加以克服呢？对此，纽伯格作了否定的回答：“电子计算机乌托邦的实行障碍来源于整理和组织数据的困难，即难于设计一种经济模式，发展一套能够管理这样复杂的模式的数学计算系统，建立适合于中央和企业传输信息的语言，并且取得输入这个模式的准确的有关未来的信息。根据现有的知识状况，希望设计出一种非常详细的能非常准确地反映一切相互作用的经济模式，是一种空想。对一切相关的变数，一切参数的价值和无数决策的函数关系缺乏完全的知识，模式开始设计的时间和模式投入使用的时间存在着差距，这一切都说明模式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外，只有在一切必要的参数可以被衡量，被编成程序和受到控制的领域，这种模式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因此，诸如产品质量和技术革新的应用这样一些基本问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29—130 页。

题 在电子计算机乌托邦模式中很难得到解决。’^①

只有当人们的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与人类自身理性能力相结合时，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消费的计划才显示出了局限性。正如前述 如果计划者的理性不受局限 或者说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无论人类文化需求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足以应付自如。如果人类文化需求比较单一，计划者也不会感到理性能力不足。只有当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消费的计划在人类文化需求复杂、多样、多变的条件下进行，而计划者的理性能力又受局限时，理性的限制才会被实际感觉到 才会出现有限理性。因此 在现实中 理性受约束的计划者要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复杂多样的文化需求状况，并使计划始终跟上这种变化，对文化资源配置作出合理地调节，这是很难实现的。

计划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论模型，要求完全信息以及计划者的完全的无限的理性，但在现实中信息并非免费物品，完全信息是做不到的，而计划者的理性则是有限的。这种完全与不完全、无限与有限的矛盾无疑是导致现实中计划体制下文化资源配置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所谓文化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指的是由于文化资源配置不当，在给定的技术状况下，不能通过投入要素 劳动和物质资本 的最有效 机会成本最低 的组合生产出最优的文化产品组合。这里所说的文化资源配置不当，既包括文化投资方向选择不当，也包括在创作、生产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的不同文化产品之间的配置不当。因此，文化资源配置不当是对存在于文化企事业部门大量损害文化资源配置效率现象所作的一种概括。诸如文化内部结构失调、投资效率过低和文化产品供求

〔美〕埃·纽伯格等：《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第 197 页。

脱节等现象的存在，都是文化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标志。文化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无疑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导致了文化产品的供给难以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正如上海市文办在 50 年代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人民对文化生活需要的增长与文化艺术工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近两年来上海艺术创作是不够繁荣的。戏曲上曾有过严重的剧目荒 电影话剧、新歌剧、音乐、舞蹈和美术的创作也很少……国产片太少，而且不少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观众感到不满意……广播节目数量少、质量低、内容空洞、形式单调 也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①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上海市尚且如此，在中国经济文化更落后的其他地区就更不需说了。

(2)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之运行机制，暗含着计划者的偏好与社会福利偏好相一致、文化发展的计划目标正好是社会文化需求目标的假定。但是，樊纲等认为，计划者的偏好与社会福利偏好相一致的假定 必须以“计划者主权机制”为前提。单一计划者主权机制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只有计划者偏好在引导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而其他行为主体的偏好只是潜在地存在，不在引导经济运行或决定任何一个经济变量的过程中发挥直接的作用。以上假设计划者主权是独立的，因此，计划者的偏好和目标函数，仅仅是在一定的资源、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控，最大化社会福利。然而，单一计划者主权机制无疑是一种理论抽象。在现实中，作为公有权主体的计划者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而是与“政府”结合在一起的，计划者的职能 只是表现为国家 (= 计划者 + 政府) 职能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现实 往往会导致“政府偏好”渗入经济计划 与计划者偏好混合在一起 通

过同一个集中指令性计划，引导经济的运行。这种现实情况可称为“国家主权机制”。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往往只是国家主权机制。也就是说引导经济运行的不是“纯粹的”计划者偏好而是“国家偏好”(=计划者偏好+政府偏好)。由于政府偏好是一种特殊的、与计划者偏好不完全相同的偏好体系，因此，有政府偏好发生作用条件下形成的经济计划，一般是与纯粹计划者主权下形成的经济计划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国家主权机制当作计划者主权机制的一个“现实变异”也可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多元主权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引导经济运行的是两种偏好体系(计划者偏好和政府偏好)而不是一种。^①

上述的分析无疑为我们理解计划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框架。在这里我们借用“单一计划者主权机制”的概念以说明配置文化资源的计划者是独立的。在此情况下只有文化主管部门的计划者偏好在引导社会的文化发展，计划者的偏好和目标函数，仅仅是在一定的文化资源、技术和社会条件下，对文化活动进行计划调控，以最大限度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但是，正如在经济领域一样，在文化领域，单一计划者主权机制无疑也是一种理论抽象。在现实中，计划者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与“政府”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现实往往会导致“政府偏好”渗入文化发展计划，与计划者的偏好混合在一起，引导社会的文化发展。由于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政府偏好”渗入文化发展计划在可能性上无疑要比渗入经济计划要深厚得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化具有影响社会伦理道德、文化环境、教育、语言等广泛的思想道德和科学领域的功能，而弘扬、维护真善美的价值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政府偏好恰当渗入文化发展计划，并不一定必然会导致

参见樊纲主笔：《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第 72—77 页。

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扭曲。但是，如果政府行为缺乏制度的有效约束，政府偏好全面扩张，甚至以政府偏好替代计划者偏好，那么文化的发展计划就有可能偏离计划者主权机制下最大限度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的目标函数。在此情况下，文化活动可能会被政治活动所替代。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实践中，上述现象乃是经常出现的。在中国，自 50 年代末以来一直到 1978 年在‘左’的政治环境下文化的创作、生产、消费事实上总是围绕‘左’的政治运动而非人们的真正文化需求运转的。比如，1958 年在‘大跃进’政治压力下文化部门事实上以‘左’的政治目标代替了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的目标。就出版而言，当时有大量滥竽充数的政治读物问世。1958 年 6 月，单是上海，就出版宣传总路线的图书 193 种，印数达到 2300 万册。1958 年，上海新华书店积压图书 4110 万册。如果我们把生产政治性读物的资源看成是生产其他文化产品的机会成本，那么对政治性读物投资的增多，便必然意味着对其他文化产品投资的减少。由此可想而知，全国的出版界乃至整个文化事业，为了所谓的“政治账”，浪费的文化资源是非常可观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于纯粹的政治需要文化事业处于严重萎缩状态。在被誉为出版‘半壁江山’的上海，1967 年出书降到 319 种，1968 年降为 273 种，1969 年则仅为 16 种。在文艺界，只有八个样板戏在一花独放，文艺园地可谓百花凋零，一派衰败景象。另一方面，在“左”的政治偏好全面扩张的情况下，文化活动都高度政治化，甚至直接就表现为政治活动。建国以后的历次文化运动，如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对《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批判、评法批儒、评《水浒》等等与其说是文化讨论，还不如说是政治批判。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学术活动和文化活动事实上已经销声匿迹了。